

谁来拯救陷入“情感荒漠化”的孩子

今年5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去了一趟新疆,朋友特地开车带他看塔克拉玛干沙漠,“那真是千里戈壁,寸草不生”。由此,他又想到了“情感荒漠化”,而这种听上去不可思议的现象,在如今的青少年当中并不罕见。

“情感荒漠化”指一个人漠视他人、漠视情感乃至漠视生命,只将注意力集中在知识和技术等狭窄的领域,为实现个人目标而很少考虑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等。

至今仍让孙云晓记忆深刻的一个案例,是北京大学生王希(化名)投毒案。“他是西北地区中学生化学大赛第一名,保送到北大。以前都是乖乖的,放学就回家,回家就学习。到北大后感到压力很大,没什么朋友,非常不适应。王希觉得宿舍一个男同学不错,就想和他做朋友,总是形影不离。但别人会感到很奇怪,怎么两个男孩子形影不离?男同学不让他老跟着,王希生气报复,投砒霜。结果,那个男孩住院治疗1年,他也被法院判刑11年。这是典型的“情感荒漠化”。

“我做儿童教育研究37年,长期以来很强烈地感受到恶性案件在增加,比如杀母、同学间相互的伤害。”孙云晓说。在他看来,徐力杀母、刘海洋泼熊等案件都和“情感荒漠化”不无关系。“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不光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还要获得丰富的情感。”

为什么小学生最不喜欢音乐课

“你看这个场面,很可怕。”孙云晓从办公桌上找出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一张照片给记者看。照片中,一个即将入学的小男孩正坐在电脑仪器前,头上缠满各种导线,“小学入学面试,孩子先测脑电图,将孩子智能优势应用到小学教育中,因材施教。”

“我很怀疑,”孙云晓说,“孩子非常容易受到诱导,用这么多线把他武装起来,孩子就会对这个结果特别相信。实际上孩子刚入学时,不能告诉他‘你什么行,什么不行’,不应该给儿童强烈的刺激。优势可以发挥,劣势也可以发展,不能这样机械化。”



(资料图片)

在应试教育观念导向的作用下,孩子逐渐与这种导向达成高度共识。1998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联合组织在全国中小学生学习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在小学生对各学科的评价和兴趣一项,最不喜欢的课是音乐,占17.7%,而美术则排在第三位,劳动排第四位;在孩子们最喜欢的课程一项,排第一的是体育,其次是语文、外语、电脑。

“我们感到很奇怪,”孙云晓说,“在儿童认知发展过程中,一般来说,音乐体育美术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这说明导向出现问题,凡是影响考试成绩的就喜欢,与考试成绩总分评定关系不大的就没兴趣。”

在孙云晓看来,由于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强化,青少年疏远文学艺术和丰富的生活,在

沉重的压力下接触的课外书减少。而在课外休息时间,父母们最希望孩子读的书还是教学参考书。青少年的审美素养、道德修养、创新能力会受到限制,以乖戾、偏执、自私、冷漠等特征为特征的“情感荒漠化”倾向随之出现。

“情感荒漠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是一种反生活的教育。基础教育本来应该是国民素质教育,现在却变成选拔教育,同时把合格教育变成淘汰的教育,把大众的教育变成精英的教育。”

实际上,“情感荒漠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孙云晓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小皇帝”现象,孩子的冷漠自私都是“情感荒漠化”。“只是越来越严重。应试教育倾向越严重,孩子生活越单调,就越容易导

致‘情感荒漠化’。”

很多家庭成了“无语家庭”

尽管极端的案例随手拈来,但孙云晓指出,更让人信服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冷漠。最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很多家庭成了“无语家庭”,孩子跟父母没话说。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做过中日韩美四国中学生比较研究。其中有一项是“遇到烦恼时你的倾诉对象”,四国中学生的第一位倾诉对象都是同性伙伴,但从第二位开始出现差异。日韩美三国都是母亲,中国则是异性伙伴。父亲在日韩美三国中排第五,中国的父亲则无缘前五,排在“网友”之后。此外,中国的父母和孩子聊天的时间也少于其他国家,即使聊天,主题还是学习。

孙云晓认为,许多父母本身也在制造“情感荒漠化”,“他们把家庭变成了学校,把自己变成了助教。学校传授知识,家庭培养情感。家庭最关心的应该是情感的发展。”可实际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54.7%的父母要求孩子读到博士,83.6%要求孩子考试考前15名。2005年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显示,母亲对孩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好好学习”,排在其后的是“功课做了没有”。

“关注孩子内心成长的家庭,‘情感荒漠化’现象就不明显。忽视的家庭这个问题就会比较突出,像离异家庭、单亲家庭孩子、留守儿童的情感荒漠化倾向就会高一些。”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教授李瑾瑾的分析,亲子依恋深厚的孩子不容易犯罪。“人在12岁以前特别需要建立起浓厚的亲子依恋感情。”孙云晓这样说。

孩子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体验

孙云晓认为,儿童教育最基本的是生活教育。“儿童长大的过程,是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过程必然包括对社会生活的了解和体验。但现在中国的儿童失去了这样的体验,教育和家庭都认为这不重要。”

生活的教育从实践中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66.8%的城市中小学生的校外活动是郊游。孙云晓介绍,现在国际上非常流行的方法是修学旅行和夏令营,他曾到日本专门考察过修学旅行,在旅行中,学生们重新编班,以便结识更多的伙伴。“这些活动的本质特点是让孩子过一种不同于学校的生活。学校教育给孩子很大帮助,同时也有很大伤害。生活不只是从家庭到学校这么简单,因此要设置假期。假期的意义不仅仅是休息,还要让孩子过不同于学校的生活。比如,夏令营最初的目的就是培养孩子间的友谊,让他们离开家庭后重组一个家庭,这才是这些活动的本质特点。”

而在中国,春游、秋游基本上只有一天,而且常常就是在市区附近游玩。即便如此,这样的活动也在普遍减少。“教育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并不鼓励孩子到野外活动,春游和夏令营等活动都降到历史最低点。”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城市中小学生的参加过3次以上的只占15.7%,农村中小学生的为5.2%;参加过一两次的,城市中小学生的比例为44.5%,农村则为28.2%。“孩子生活的贫乏也容易导致‘情感荒漠化’。”孙云晓这样提醒。

据《中国青年报》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敏 电话 67655277 E-mail: cpyy@163.com

时政点击

通用破产保护为中国企业退市带来启示

我国大型企业的重组基本由政府直接介入,表面上减少了社会成本,事实上以低效企业挤压了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导致整体社会重组成本提高。推行中国的破产保护法,是企业以市场化的方式退出市场的好办法。

企业破产需要支付社会成本,企业越大支付的成本就越高。观察汽车行业巨头通用汽车的破产重组案,如何减少社会成本是值得重视的观察视角。

破产有几大社会成本,一是保障失业劳工的利益,二是顺利清理债权债务关系,三是解决公司产品与品牌等方面的后遗症。

美国的破产保护是减少社会成本的关键,此法旨在通过重组挽救企业,避免社会支付最大的代价。否则,每个企业的破产清算,都将向社会扔下一枚炸弹。通用公司按照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申请破产保护,而不是按照第七章直接破产清算,就是为了扔掉包袱,尽快复苏,在法律的羽翼下实现重组。

破产保护是个还有复苏希望的企业实现凤凰涅槃的过程,企业在特定的时间内(通常为120天)出售资产、保留优质资产,实施产业调整,以期渡过危机。破产保护既能保证通用照常运营,其股票和债券可以继续交易,而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还能保持不变。相比其他破产方式而言,破产保护提供了债权人与投资者与债务方博弈的权益,还能让利益相关者为公司的生存、复苏做出理性妥协。

资产重组是减少成本的重要环节。在通用的债务重组过程中,美国纳税人出资500亿美元获得60%的股权,成为通用的控股股东,而包括共同基金和上千名个人投资者在内的通用债券持有人将债权转换为通用公司的股票,抵消了通用公司约270亿美元的债务。这减少了社会震荡的范围,阻止负面影响传递到债券与股票市场。

股权成为保障员工利益的最后手段,工会获得公司17.5%的股权,这样工会必须提高企业的效率,增加产品的销量,使手中的股权增值。倒推回去,如果不实行破产保护,而实行破产清算,失业的人数将成倍增长,所有雇员都将失去工作,他们得到的作为最后保障的股权也将毫无意义。

通用破产造成的失业打击是可怕的。通用作为美国中西部多个州的支柱产业,直接雇佣约9万人。根据美国汽车研究中心的统计,通用申请破产保护将额外导致相关产业链上130万人失业,可能将美国失业率推高一个百分点。同时,对其他国家的就业也冲击巨大。为此,各国政府都在消化通用失业冲击波,忙于保护本国的通用子公司,寻找重组方,防止冲击波扩大。

不可否认,此次通用破产重组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政府介入与债券持有人谈判,保护时间极短,政府试图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趁通用优质资产尚存时,解决棘手的问题。我国历史上申请破产保护的案例中,70%的企业在半年后难免清盘的命运,但通用以国有化与破产保护双层防护垫,避免(最起码是推迟)了大限的到来。

大到不能倒企业只有通过破产重组找到新的市场,各利益主体才能得到保护。这也提醒我们,不能倒的低效企业越多,社会经济也就越不安全。我国《破产法》中,还缺少完善细致的破产保护程序,甚至申请破产企业案例也不多。我国大型企业的重组基本由政府直接介入,表面上减少了社会成本,事实上以低效企业挤压了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导致整体社会重组成本提高。推行中国的破产保护法,是企业以市场化的方式退出市场的好办法。 叶檀

“高考降温”折射底层人固化危机

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姜钢说,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约为1020万人,比去年约减少40万。不过姜钢否认高考报名人数减少主要是因就业难造成的说法。他说,这主要跟适龄人口减少有关。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在今年1020万高考报名考生中,应届高中毕业生为750万。这就意味着尚有8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没报名参加今年的高考。(《新京报》6月3日)

今年高考将近,终于没有了往年“高考人数突破X万”的新闻,而是各地纷纷报出高考人数出现减少状况。这是个什么样的信号?一时间众说纷纭。除了官方的“人口减少说法”之外,还有“就业难”、“多元化”等多种观点。

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这是事实。不过,大学生就业难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何以单单体现在今年的高考中?再者,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固然给就业造成了影响,但还不至于立即

辐射到高考环节上来——故而,就业危机或许是导致高考人数下降的因素之一,但绝不会是主要因素。至于说高考人数下降表明社会成才观多元化,就更不可靠了。目前来看,由于户籍、收入分配、教育等诸多领域体制性的落后和分配不公,阶层之间流动困难,高考仍然是普通大众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元成才观”根本就不具备成长的空间。

现实中,人们一边质疑现行高考制度存在着诸多弊端,但却一边老老实实通过高考去拿一张有机会通往上层的“准通行证”,原因就在于此。因为体制的壁垒,因为机会的稀缺,不合理的高考制度成为相对公平的路径。如果没有一个有权有势有钱的“好爸爸”,为了改变命运,唯有参加高考——而回过头来说,大学毕业后固然很难找工作,但不上大学就容易找到工作吗?放弃高考,多数是一种无奈而被动

的选择,而非多元成才的自由。这是一个必须要理清的问题。

请允许我以“小人之心”进行一番揣测:放弃高考的人当以贫困家庭出身的学子为多。无须讳言,富裕家庭的孩子大抵是不必为考大学还是不考大学而思量的,考上了要上,考不上也会有很多选择,譬如自费出国。只有穷人的孩子,才会面对就业危机、高昂的学费,进行帐目百转的人生盘算,“犹豫”和“权衡”——上大学合不算?最终有人洒两滴酸楚之泪,挥挥手望大学而兴叹。人往高处走,这是一种朴素的人生愿望,当放弃高考这一机会之后,改变命运的途径只能是外出打工,走上与其父辈近乎雷同的人生轨迹。

考不考大学,是个体的自由,但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放弃考大学,就是令人警惕的自我放逐。我们要正确品读这种自我放逐背后的悲苦与无助,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社会底层人固化危机。 陈一舟

高考从独木桥到立交桥有多远

很让人吃惊的。重庆有个中学,一个班级29人,统统被美国高校录取。所以他们集体放弃了高考——准确地说,是放弃了中国的高考,选择了留学(《重庆晨报》6月2日)。

今天的高考,已趋向多元。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说,高考就是要砍掉“独木桥”,建设“立交桥”。戴家干是从让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的角度而言的。我认为,“立交桥”不仅是指让更多的人能够“过桥”,还应该是高考方式、求学路径的多样化。

张爱玲小说《小团圆》中的第一句是:“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此般“大考”,一定是“独木桥”而非“立交桥”。因为“立交桥”一定是多元化的。

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就是高考路径多元化的有益探索,这有助于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而有个“佳话”更值得褒扬:复旦大学把38岁的蔡伟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38岁读博士不稀奇,稀奇的是蔡伟只有高中学历,下岗十余年,之前他还是蹬三轮养家糊口的三轮车夫。重才重质不重文凭,唯此,才能“复旦复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没有这样的求学“立交桥”,蔡伟只能在三轮车上看古文字书籍了。

“蔡车夫”的特长是古文字学。真正的特长生,当然是瑰宝。有位中学老师说得深切:“中国的这种应试教育,使多少有特长的孩子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人们都说考试是最公平的,岂不知一元化的“凭考定终身”本身就会造成巨大的不公。在科举时代,吴敬梓、吴承恩、曹雪芹、蒲松龄等等都曾从“独木桥”上摔下来,而事实证明,他们才是真正的“潜力股”、“特长生”。

奇怪的是,如今在学生的求学路上,一些学校和家长却在制造“伪特长生”,比如备受诟病的奥数。奥数本来是数学天才准备的,可是为了择校,在一些地方人人都要学奥数,奥数竟然成了一条通往名校的新的“独木桥”。中国小学的奥数题,甚至难倒国际数学大师。奥数本是菜刀,作为工具它是切菜的,我们的一些地方教育机构却拿它来杀人。不是特长生,制造特长生,升学之后,所谓特长生也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还有一种“伪特长生”,就是被媒体曝光之后引起全国关注的浙江“航模生”。“航模加分”被指多年来自权势家庭,成了一种乱象,是高考的“偷渡船”。那么,这种关乎高考的“多元形态”,戕害了公平竞争,恰恰是应当被抛弃的。

高考从单一化的“独木桥”到多元化的“立交桥”,是一条必由之路。没承想,高考过程中的违法乱纪却多元化了。试卷泄密、高科技作弊、行贿录取等等之外,还出现了湖南省“罗彩霞案”以及众多不同地方的版本。这些多元的犯罪手法,务必严厉打击。 徐迅雷



“内幕消息”骗钱财

《北京晨报》报道,3名20多岁的女大学毕业生,利用股民盲目相信内幕消息的心态,冒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名义提供证券咨询,诈骗外省市18名股民7万余元会费,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盲目相信“内幕消息”以致上当的股民,自然值得同情,但是,他们怎么就没想到:如果真有那么准确又灵验的能使你瞬间暴发致富的股

市“内幕消息”,这些掌握此类“内幕消息”的人,何不独占大赚一笔的绝佳时机呢;他们为何犯傻,乐意挣一点有限的佣金,而将最佳投机收益拱手让与毫不相识的普通股民?其实,有时候上当不受骗并不需要有太高深的学问,仅仅需要保持一颗不贪食来之的平常心就行了。睁大眼睛,捂紧钱袋,是善良的人们在各种诱惑面前必须记住的行事准则。 吴之如 文并画

别把“教师高考烧香”看得太悲怆

高考临近,一些佛教名山迎来了一拨儿又一拨儿的高三老师,他们祈祷着今年高考自己带的学生能有个好“收成”。数月前,广西铁路某中学派出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作为代表,来到湖南衡山的衡山烧香拜佛,祈求该校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顺顺利利,考出好成绩。每年派老师到庙里求考,已经成为这所学校的公开秘密。(《中国青年报》6月3日)

高考前教师乃至学生烧香拜佛祈求一个好成绩的事情,并不鲜见。只不过,如此考前烧香拜佛成为一种“组织化”的行为——由学校统一选派且“报销差旅费”,多少让人有些瞠目结舌。祈求美好,是人的一种天性,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数千年祈福文化的国度里。换言之,我并不认为,教师考前烧香是单纯的迷信,而更像是谋求某种心理寄托。

正如这天下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是什么让传播文明科学的为人师表者不愿职业尊严对烧香拜佛趋之若鹜?答案并不复杂,几乎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儿。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在一考定终身的指挥棒下,学生的高考成绩决定着学校的形象、排名、获得教育资源配置多少。学校有压力便给予教师压力,教师有压力便转给学生……而考前烧香,似乎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教师释放压力的形式之一。

或许正因如此,对于“教师高考烧香”现象,舆论不仅报以充分的宽容,还流露出显而易见的心疼感:老师压力太大,不堪承受。在现行体制下,教师的荣誉、待遇、职称,无一不与学生成绩紧密联系,一旦达不到指标,就有下岗的危险。老师也是普通人,也需要张弛有度的生活,也要养家……长时间高强度的

工作会吞噬教师的健康。

“老师和学生一样,也需要爱护,学校和社会应该多创造宽松的环境,不可再急功近利了。”读着这则报道的最后一段话,我不禁哑然一笑:在教育急功近利这根藤上,教师真的仅仅是受害者吗?我承认,目前的高考环境下,教师的压力很大。但却不能否认,教师也是教育功利最直接的利益获得者——学生高考考得好,他们会获得少则数千多则上万乃至数十万的奖金,辛苦能获得“回报”。想来,他们在佛前的祈祷,也难免掺入利益驱动的成分。

与之相比,学生才是教育功利完全上的受害者,付出了常人难以相信的汗水和泪水,付出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而即便是教师烧香期盼的高额奖金,也是从学生的腰包上来的吗?所以,别把“教师高考烧香”看得太悲怆,这种难脱利益色彩的荒唐行为所反衬出来的,首先是教育体制的悲哀,其次才是教师群体的压力。 鱼烟罗